第 37 卷 第 4 期 财经研究 Vol. 37 No. 4
2011 年 4 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pr. 2011

财政分权、银行信贷与全要素生产率

王定祥，刘 杰，李伶俐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文章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利用 1985—2008 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银行信贷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始于 1985 年的财政分权改革有效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分权制度下政府主导的国有银行信贷总体上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而 1994 年进一步分权分税改革后，政府对金融部门干预过度，使银行信贷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进一步地，本文利用 Malmquist 指数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以考察银行信贷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路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银行信贷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路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路径并不显著。

关键词：财政分权；银行信贷；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 指数法

中图分类号：F812.2；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4-0069-11

一、引 言

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 2010 年上半年，中国 GDP 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虽然众多，但依据经济增长源泉划分，不外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过去 30 多年来，以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为特征的资本积累与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受要素稀缺与资源环境的制约，继续遵循以资本积累与资本形成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要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

鉴于此，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给予了广泛关注，取得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张军和施少华（2003）、颜鹏飞和王兵（2004）、郭

收稿日期：2010-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YJC790223）；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2009JJ09）

作者简介：王定祥（1972—），男，重庆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 杰（1987—），男，湖北洪湖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
李伶俐（1977—），女，重庆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庆旺和贾俊雪(2005)通过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率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投资带动高增长的过程,[①]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Helpman 和 Krugman(1985)、Benhanbib 和 Spiegel(1994)、Filmer 和 Pritchett(1999)、岳书敬和刘朝明(2006)、王志刚(2006)、郑京海(2008)等则从人力资本、FDI 和教育等视角对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进一步地,在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上,张军和金煜(2005)利用 1987—2001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银行信贷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类似的研究还有孙伍琴和朱顺林(2008)、姚耀军(2010)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其中无论是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财政体制改革,都深刻地影响着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作用。如果忽视了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背景,所得到的结论可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目前以财政体制改革为背景讨论银行信贷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陈刚、尹希果和潘杨(2006)在实证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发现,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显著降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张璟和沈坤荣(2008)利用 1991—2005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财政压力以及地区间 GDP 的竞争,必然会产生对本地国有银行贷款决策的干预动机,从而固化我国目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现有文献为我们考证财政分权、银行信贷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补充或改进之处:其一,财政分权指标普遍选用的是地方财政支出与全国财政支出的比值,这使得各地区财政分权指标的分母相同而产生多重共线性。其二,在金融发展指标上,陈刚、尹希果和潘杨(2006)以及张璟和沈坤荣(2008)使用地区金融机构存贷和与 GDP 的比值表示,考虑到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依然很大且存在大量由政府主导的指令性和政策性贷款,因此,该指标含有政府干预因素,这使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的交叉项在模型中失去了意义。张军和金煜(2005)构造非国有部门贷款指标来表示金融深化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与银行信贷的交叉项来衡量政府干预下的金融体系,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低于发达地区,GDP 总量亦较小,使用二者的比值难以区分不同地区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程度。其三,许多学者的研究样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事实上中国的财政分权始于 1985 年,1994 年分税制改革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财政分权体制,所以样本可追溯到 1985 年。

基于上述缘由,本文不仅将在理论上重新梳理和构建,在实证指标和样本时间段的选择等方面也将作进一步改进。首先,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项目中包含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所以必须将这部分剔除才能准确

衡量财政分权后的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于是,本文使用各省本级人均财政支出与各省本级人均财政支出和中央本级人均财政支出之和的比值来衡量财政分权。在银行信贷上,本文认为,由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机构(国有银行)更容易受地方政府部门的影响,而内生性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的独立性则更强。因此,我们用非国有银行贷款与 GDP 的比值来衡量内生金融发展水平,用国有银行贷款占 GDP 的比重与财政分权指标的交叉项来衡量财政分权制度下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影响。其次,本文将样本区间扩展为 1985—2008 年,样本量的扩大有助于提高模型的估计精度。最后,本文利用 Malmquist 指数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以考察区域金融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内在路径。

二、财政分权、银行信贷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

(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众所周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路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除了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外,还受经济制度的影响。其中,财政金融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央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政府集中了全部财政收入并为地方政府制定了统一的预算收支。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和责任权限,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方面难以发挥主导作用。但 1985 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分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拉开了财政分权改革的序幕。财政分权改革不仅能够改进不同层级政府的激励,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Weingast,1997),而且赋予地方政府公共产品自主权,推进了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地方政府在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大的财政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基于地区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必然会产生对本区域金融机构的干预动机。这种干预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运用自身的行政职权引导银行部分信贷资金流入特定的行业部门或直接下达指令性贷款命令。于是,财政分权带来地方政府对金融部门干预的不断增强,自然会使财政、金融对经济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协同影响。1994 年进一步的财政分权(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比大幅下降,从而强化了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配置的动机,以弥补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

财政分权背景下金融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增强。而金融部门究竟需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学界有不同的争论。例如,Mckinnon 和 Shaw(1973)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现象,政府强制规定了存贷款利率的上限,使利率无法反映出市场上信贷资金的供求情况,严重影响了金融体系的价值判断和监管职能,这必然会造成金融部门不良贷款率的攀升和资金配置效率的下降,使得金融与经济之间相互掣肘、相互制约。然

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Stiglitz和Hermann(1991)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干预问题,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政府对金融部门的适当干预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显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提高金融部门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市场机制主导信贷资源配置的完全有效性需要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如借贷双方信息完全对称、诚实守信、完全竞争等)下,而现实中的金融市场并不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主导信贷资金配置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失灵”,因而在金融发展与金融资源配置中,适度的政府干预仍然是必需的。综观我国财政与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也不难发现,政府干预金融有其必然性。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为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而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金融体制,到1985年后国有专业银行的相继组建,再到1990年后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与股份制改革,无不体现了政府主导金融发展的烙印。而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1994年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既带给地方政府更大的支出责任和经济发展责任,也释放出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依赖和干预。当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时,地方政府转而从地方金融机构融资,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事实上,在经济发展初期,金融内生能力不足也需要政府组建金融机构向经济体注入资金,这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恢复性起飞,而且有利于金融的快速发展。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政府通过外生性金融机构的迅速扩张和推行差别信贷优惠利率,为实体经济领域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加快了重点产业和落后经济部门的发展,推进了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政府通过对存贷款利率的有效控制为金融部门创造了租金效应,也推动了银行部门的快速发展。

(二)政府的金融干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假设地方政府干预下金融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政府金融干预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另一部分为负面效应。[②] 地方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力度用x表示。因此,政府的金融干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TFP=g(X)+f(X)+u \tag{1}$$

其中,TFP为全要素生产率,g(X)为地方政府金融干预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且$g(X)<0$,f(X)表示地方政府金融干预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且$f(X)>0$,u为其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微观经济学理论可知,收益与利润函数均为因变量的二次函数,因此,政府金融干预的正面效应函数可以表示为:

$$f(X)=AX^2+BX \tag{2}$$

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有$A<0$,$B>0$,将(2)式代入(1)式可以得到:

$$TFP=g(X)+AX^2+BX+u \tag{3}$$

为研究方便，假定政府金融干预的负面效应 g(X) 和其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u 为定值，并令 F(X)＝TFP－u，Y＝g(X)，则有：

$$F(X)=Y+AX^2+BX \tag{4}$$

在(4)式中，F(X) 表示政府金融干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效应，对 X 求一阶导数得：

$$F'(X)=2AX+B \tag{5}$$

由(4)式和(5)式可知，当 F(X)＝0 时，$X=(-B\pm\sqrt{B^2-4AY})/2A$；当 F′(X)＝0 时，X＝－B/2A。令 $X_1=(-B-\sqrt{B^2-4AY})/2A$，$X_2=(-B+\sqrt{B^2-4AY})/2A$，$X^*=-B/2A$，则上述过程可以用图 1 来反映。图 1 揭示了政府干预下金融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其中，纵轴为政府金融干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效应，横轴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力度。显然，当 $0<X<X_1$，满足 F(X)＜0，且 F′(X)＞0，政府微弱的干预力度使其本身的正效应无法扭转市场失灵，从而无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时，政府干预的总效应表现为负；当 $X_1<X<X^*$ 时，F(X)＞0，且 F′(X)＞0，政府干预的总效应为正，随着政府干预力度的不断增大，总效应随之增加；当 $X=X^*$ 时，总效应达到最大值；而当 $X^*<X<X_2$ 时，F(X)＞0，且 F′(X)＜0，此时，政府干预中不合理的因素在逐渐扩大，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总效应会不断地降低；当 $X>X_2$ 时，F(X)＜0，且 F′(X)＜0，此时，政府对金融部门的过度干预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得总效应为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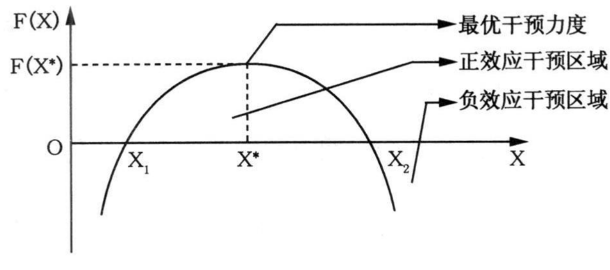

图 1　政府金融干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

从上述数学模型的简单推理可知，在当前我国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且金融深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改善时，政府对金融部门施加一定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政府的干预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政府出于政治晋升的目的或地区间的非良性竞争而加大对金融部门不合理的干预力度会造成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和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的迅速攀升，从而更无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三、模型设定、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实证指标的选择。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尽量控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其他变量，以避免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于是本文设定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mathrm{TFP}_{it}=\alpha_i+\beta_1\mathrm{FINS}_{it}+\beta_2\mathrm{FD}_{it}+\beta_3\mathrm{FIN}_{it}\times\mathrm{FD}_{it}+\sum_j\gamma_i\mathrm{CONTROL}_{jit}+\mu_{it}\quad(6)$$

其中,TFP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FINS 表示非国有银行贷款,以反映内生性银行信贷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FD 衡量财政分权程度;FIN 表示国有银行贷款;FIN×FD 为国有银行贷款与财政分权的交叉项,用来检验政府干预下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CONTROL 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率、固定资产投资率、对外开放程度、外资利用率以及人力资本。下面对各个实证指标作简要说明:

1. 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借助经 Fare(1994)改进后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以真实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作为投入变量、以真实 GDP 作为产出变量来计算 TFP 指数;然后,利用 Shephard 距离函数将 TFP 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其定义如下:

设(x_t,y_t)和(x_{t+1},y_{t+1})分别为 t 时刻和 t+1 时刻的投入产出组合,因此,t+1时刻相对于 t 时刻的 Malmquist 指数为:

$$M^{t+1}(x_t,y_t,x_{t+1},y_{t+1})=\left[\frac{d^t(x_{t+1},y_{t+1})}{d^t(x_t,y_t)}\times\frac{d^{t+1}(x_{t+1},y_{t+1})}{d^{t+1}(x_t,y_t)}\right]^{\frac{1}{2}}\quad(7)$$

其中,$d^t(x_t,y_t)$、$d^t(x_{t+1},y_{t+1})$、$d^{t+1}(x_t,y_t)$和 $d^{t+1}(x_{t+1},y_{t+1})$分别表示不同时期的技术效率。在多时期的动态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包含生产资源配置的变化和技术水平的变化,因此,Malmquist 指数可分解为如下形式:

$$M^{t+1}(x_t,y_t,x_{t+1},y_{t+1})=\frac{d^{t+1}(x_{t+1},y_{t+1})}{d^t(x_t,y_t)}\left[\frac{d^t(x_t,y_t)}{d^{t+1}(x_t,y_t)}\times\frac{d^t(x_{t+1},y_{t+1})}{d^{t+1}(x_{t+1},y_{t+1})}\right]^{\frac{1}{2}}\quad(8)$$

其中,括号外为两个时期资源配置效率的比值,即技术效率指数;括号中可以看作两个比率的几何平均数,即技术进步指数。据此,我们将 Malmquist 指数分解成了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M_{TFP}^{t+1}(x_t,y_t,x_{t+1},y_{t+1})=M_{EC}^{t+1}(x_t,y_t,x_{t+1},y_{t+1})\times M_{TC}^{t+1}(x_t,y_t,x_{t+1},y_{t+1})\quad(9)$$

在核算 TFP 指数时,真实资本存量用 Goldsmith(1951)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基本公式为:

$$K_t=I_t/P_t+K_{t-1}(1-\delta)\quad(10)$$

其中,K_t 为当年的真实资本存量,I_t 为当年扣除了金融部门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P_t 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δ 表示折旧率。各省 1985 年的真实资本存量以张军(2005)的数据为依据,折旧率取 6%(Young,2000)。劳动力投入以各省当年的就业人数来衡量,GDP 为剔除了物价因素的真实 GDP。

2.银行信贷。本文用非国有银行信贷与 GDP 的比值来衡量内生金融发展水平(FINS),用国有银行贷款占 GDP 的比重与财政分权的交叉项来衡量分权制度下政府对金融的干预(FIN×FD)。

3.财政分权。对于财政分权指标(FD),本文使用地方本级财政支出与地

方和中央两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值来测算。

4.控制变量。第三产业比重(GDP_3)用各省第三产业 GDP 与 GDP 总量的比值来衡量。城市化率(URB)用各省非农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率(TZ)用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表示,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均为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物价指数进行平减后的真实值。对外开放(OPEN)指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由于统计年鉴上进出口额均以美元计价,我们用 1985—2008 年各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价将其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外资利用率(FDI)使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与 GDP 的比值来衡量,同样用 1985—2008 年各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价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人力资本(EDU)用各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是 1985—2008 年中国大陆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难以收集,本文予以剔除;而重庆 1997 年才成为直辖市,因此,本文将其与四川省合并。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各省统计年鉴(2000—2009)、《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金融年鉴》(2009)、《中国财政年鉴》(2000—2009)、《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90—2008)、《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2009)、《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0》以及各省的金融运行报告(2004—2009)。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TFP	696	1.1130	0.0030	1.0980	0.8660	1.5790
FINS	696	0.2415	0.0083	0.1862	0.0020	1.2670
FIN	696	0.9474	0.0101	0.9006	0.4912	2.2579
FD	696	0.7101	0.0039	0.7135	0.2319	0.9500
GDP_3	696	0.3463	0.0059	0.3437	0.1789	0.7320
URB	696	0.2979	0.0059	0.2469	0.0711	0.8746
TZ	696	0.3673	0.0045	0.3437	0.1528	0.8730
OPEN	696	0.2964	0.0175	0.1101	0.0000	3.7171
FDI	696	0.0280	0.0013	0.0157	0.0000	0.2425
EDU	696	0.0061	0.0002	0.0030	0.0005	0.0367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 Eviews6.0 软件对 1985—2008 年财政分权、银行信贷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估计。模型Ⅰ中只包含了非国有银行信贷(FINS)、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与国有银行信贷交叉项(FIN×FD)三个变量;模型Ⅱ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引入了控制变量,以检验财政分权、银行信贷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稳定性;模型Ⅲ在模型Ⅱ的基础上加入了 1994 年虚拟变量、财政分权与国有银行信贷交叉项(FIN×FD×DUM94),以考察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金融干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

表 2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1985－2008 年)

变　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C	0.9038***	1.0753***	1.0761***
FINS	－0.1968***	－0.2638***	－0.2324***
FD	0.2170***	0.0976*	0.0510*
FIN×FD	0.1464***	0.2132***	0.2359***
FIN×FD×DUM94			－0.0363***
GDP_3		0.4019***	0.3852***
URB		－0.0928	－0.0420
TZ		0.0041	0.0097
OPEN		－0.0104	－0.0121
FDI		0.6234***	0.7876***
EDU		5.6664***	5.6471***
R^2	0.39	0.27	0.28
F 值	5.22***	6.78***	6.83***
Hausman 检验统计值	25.63***	26.44***	29.18***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在模型Ⅰ中，非国有银行信贷(FINS)的系数为负，表明中国内生金融的发展还没有成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有利因素。这可能是由于受金融市场准入条件的严格限制，中国内生金融的发展依然滞后，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同时，非国有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其信贷资金大量流向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而忽视了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财政分权(FD)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前述理论分析一致。财政分权与国有银行信贷交叉项(FIN×F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大多数学者(张军和金煜，2005；陈刚、尹希果和潘杨，2006；张璟和沈坤荣，2008)关于“政府干预下金融发展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不利因素”的结论迥然不同。这种差异一方面可能源于样本区间和实证指标设计的不同；另一方面，由于内生金融供给的不足，由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表现在对地方经济结构的熟悉和对本地居民偏好的了解，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与支出权利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张晏和龚六堂，2005)。模型Ⅱ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后，非国有银行信贷(FIN)、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与国有银行信贷交叉项(FIN×FD)的符号没有发生变化，说明财政分权、银行信贷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较稳定的关系。在模型Ⅲ中加入 FIN×FD×DUM94 后的估计结果显示，FIN×FD×DUM94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FINS 与 FIN×FD 的系数符号保持不变。这说明分税制改革后，政府对金融的干预逐渐偏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合理干预金融的边界，政府干预中不合理的因素显著增加，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逐渐弱化。

由模型Ⅱ和模型Ⅲ可知，在控制变量方面，第三产业比重(GDP_3)、外资利用率(FDI)和人力资本(EDU)都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化率(URB)的

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表明虽然我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但目前不少城市产业化率依然不高,产业空心问题突出,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主要集中于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流水线,使得城市化难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率(TZ)的系数不显著且偏小,说明传统依赖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外开放程度(OPEN)的系数在模型Ⅱ和模型Ⅲ中也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该指标与外商直接投资高度相关,其作用被FDI弱化所致。

为了进一步考察分权制度下银行信贷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内在路径,我们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将TFP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C)和技术进步指数(TC),并构建以下模型:

$$EC_{it}=\alpha_i+\beta_1 FINS_{it}+\beta_2 FIN_{it}\times FD_{it}+\sum_j \gamma_i CONTROL_{jit}+u_{it} \tag{11}$$

$$TC_{it}=\alpha_i+\beta_1 FINS_{it}+\beta_2 FIN_{it}\times FD_{it}+\sum_j \gamma_i CONTROL_{jit}+u_{it} \tag{12}$$

我们对(11)式和(12)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Ⅳ的估计结果显示,FINS不显著,FIN×FD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但偏小;在模型Ⅴ中,FINS的系数显著为负,FIN×F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银行信贷资金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路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改善路径的作用非常弱。这可能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企业)将获得的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引进先进的设备和生产流水线,从而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反,对企业员工进行素质培训和员工福利待遇方面的资金支持不足直接造成了员工素质普遍不高、生产积极性差,从而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事实上,当前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效率低下问题就是明显的例证。

表3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1985—2008)

变　量	模型Ⅳ	模型Ⅴ
	EC	TC
C	1.0344***	1.0713***
FINS	−0.0231	−0.2655***
FIN×FD	0.0303**	0.1930***
GDP_3	0.1255**	0.1796***
URB	−0.0599**	−0.0505
TZ	0.0109	0.0216
OPEN	−0.0026	−0.0055
FDI	0.1332*	0.4893***
EDU	1.7330**	3.6116***
R^2	0.22	0.28
F值	1.77*	7.39
Hausman检验统计值	1.59	31.21***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8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分权、银行信贷与

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始于 1985 年的财政分权制度改革有效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银行信贷方面,内生性金融信贷并没有成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因素,而政府主导的外生性金融信贷对全要素生产率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分税制改革后,政府对金融的干预逐渐偏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合理干预金融的边界,国有银行信贷资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银行信贷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路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通过技术效率路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尚不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的政策含义主要有:(1)政府应对内生性金融机构的发展给予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如营业税费的减免、再贷款的优惠等,稳步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加快内生金融有效发展的制度供给,促进内生金融稳健发展;而内生性金融机构应当注意调整信贷结构,重点将信贷资金投入到技术含量较高的实体经济领域。(2)应确保政府对金融部门决策干预的公开性、适度性、平等性和科学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要做到"激励相容",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引导金融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确保实体经济主体合理的资金需求得以有效满足,稳定金融市场,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3)适当扩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权利,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严格区分财政与金融在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职能和界限,避免金融财政化,防止政府对金融部门的过度干预。(4)企业应充分挖掘自身潜能,调整信贷资金运用结构,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结构,实行技术与效率并重的发展战略,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积极主动走内涵式发展道路。(5)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加强科学经营与管理,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推进产品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氛围,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注释:

①中国在过去的 30 年里保持了高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目前资本形成率约为 42%(王小鲁、樊纲和刘鹏,2009)。

②政府金融干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效应表现为供给效应和租金效应,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银行资金配置效率的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攀升以及金融资源的浪费。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17－24.

[2]张军,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与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J].经济研究,2005,(11):34－45.

[3]王兵,颜鹏飞.中国的生产率与效率:1952－2000——基于时间序列的 DEA 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8):22－30.

[4]陈刚,尹希果,潘杨.中国的金融发展、分税制改革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06,(2):99－109.

[5]孙伍琴，朱顺林．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研究——基于 Malmquist 指数的分析[J]．统计研究，2008，(3)：46－50．
[6]张璟，沈坤荣．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基于财政分权背景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8，(6)：122－141．
[7]姚耀军．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0，(4)：26－31．
[8]Helpman E，Krugman P．Market and Foreigntrade[M]．MIT Press，Cambridge，1985．
[9]Bencivenga V R，B D Smith．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1991，58：195－209．
[10]Filmer D，Pritchett L．The impact of public spending on health：Does money matter[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1999，49(1)：1309－1323．
[11]Mckinnon R I．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73．
[12]Weingast B．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7，91：245－263．

Fiscal Decentralization，Bank Credi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ANG Ding-xiang，LIU Jie，LI Ling-l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refor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bank credi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85 to 2008.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refor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hich began in 1985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and und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government－led state－owned bank credit overall rai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owever，further decentralization and tax reform since 1994 results in undu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financial sectors which has whittled awa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bank credi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urthermore，it applies Malmquist index to divid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to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index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dex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ternal route about how bank credit accelerat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t shows that，und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bank credit enhanc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ainly throu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oute rather than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route.

Key words：fiscal decentralization；bank credit；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Malmquist index

（责任编辑　许　柏）